

《西方思想 3000 年》编辑委员会

主 编:孙鼎国 王 杰

编辑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 杰 王工斌 王统销 冯 丹 朱煜华

刘 力 孙鼎国 李德深 张文玲 陈德仲

钱俊生 黄宪起 谢武军

鲍东明 潘志娴

学科分主编:哲学思想 孙鼎国

逻辑思想 朱煜华

伦理思想 刘 力

宗教思想 冯 丹

经济思想 王 杰 李德深

政治思想 黄宪起

法律思想 陈德仲

史学思想 张文玲 王统销

文学思想 谢武军

美学思想 何秋和 李双阳

教育思想 鲍东明

心理思想 鲍东明 王工斌

科技思想 钱俊生 潘志娴

撰 稿 人:(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 杰	王 原	王工斌	王建平	王统销
仇加勉	孔慧英	田钧山	史小平	冯 丹
冯永胜	朱煜华	朱玲珑	刘 力	刘永桂
刘阿林	刘建丰	江 曼	汤志群	安 杰
孙桂兰	孙鼎国	何秋和	李云龙	李双阳
李汉松	李南起	李德深	严 治	杜志华
邱淑珍	肖胜喜	金立亨	庞桂青	庞景君
易建国	罗建平	杨 林	张文玲	张水云
张会军	张晓玲	陈 君	陈邦勋	陈宇飞
陈德仲	周 慧	袁志刚	贾新奇	钱俊生
徐 莉	黄东升	黄宪起	康断文	康曼华
崔七星	梅志忠	蒋阿依	韩振海	傅 立
谢廷荧	谢邦宇	谢武军	廖小鸿	慕子旅
鲍东明	潘志娴	樊敏飞		

前 言

西方思想,主要是欧洲思想,其发展虽然晚于几大文明古国,但如果从古希腊文明算起,也有二三千年的历史,如果从克里特和迈锡尼文明算起,就更久远了。一般说来,希腊文明是西方思想史的真正源头,因为整个西方文化的客观内容,在古希腊时期已经初具雏型,它在哲学、政治、经济、法律、伦理、教育、文学、艺术、逻辑、科学技术等各领域的思想,在古希腊已见萌芽。整个西方思想史,从一定意义上说,实际上是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各种思想萌芽,在不同时代根据不同需要的展开、扩充、成长和升华。古希腊是西方思想的故乡。古罗马时期形成的基督教思想,在欧洲统治了整个中世纪,至今仍是西方文化的重要成分。文艺复兴以来出现的人文主义、理性主义以及以实验和理论相结合为特征的自然科学思潮,成为西方资产阶级夺取和巩固政权、征服自然、发展经济的有力武器,并且经过近代几百年的发展,这些思想已成为西方文化的重要内容和特征。西方国家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变、过渡的过程中,遇到了种种矛盾和问题,各个思想领域的理论成果,正是他们探索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历史记录。他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里创造的各种积极的精神成果,一方面带有资产阶

级的特征,同时,也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特别是他们在经济、科学技术领域的成就,对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使他们在近几百年内,远远走在了前头。马克思主义自成体系,本书所述西方思想,不包括马克思主义。

我们正处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清醒地理智地看待西方社会中形成的精神成果,批判地吸收消化其一切科学的、有效的发明、发现和成就,对于振兴我们伟大的国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科学思想无国界。古人云:“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江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不应忘记这些珍贵的古老箴言。当然,我们知道,吸收他人成就,是为了自我的发展,学习别人的经验,是为了更好地创造,借鉴和学习一切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是为了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在西方文化思想成果面前,妄自菲薄和夜郎自大,都是错误的。我们既要有虚怀若谷的谦虚态度,又要有坚定的民族自信。中华民族有足够的聪明和才智,经过艰苦的奋斗,一定能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我们编写《西方思想 3000 年》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广大读者更好地了解西方思想,以便于学习借鉴,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由于工程浩大,内容丰富,学科较多,加之我们学识水平有限,难免出现疏漏和错误,诚恳地希望专家学者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孙鼎国

1998 年于北京大有庄 100 号

西方思想的历程*

(代序)

[英]罗素**

我们所说的“哲学的”人生观与世界观乃是两种因素的产物：一种是传统的宗教与伦理观念，另一种是可以称之为“科学的”那种研究，这是就科学这个词的最广泛的意义而言的。至于这两种因素在哲学家的体系中所占的比例如何，则各个哲学家大不相同；但是唯有这两者在某种程度上同时存在，才能构成哲学的特征。

哲学这个词曾经被人以各种方式使用过，有的比较广泛，有的则比较狭隘。我是在一种很广泛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现在就把这一点解释一下。

* 本篇选自罗素所著《西方哲学史》中的绪论部分，全文登载，作为本书的导读，供读者参考。

** 罗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英国哲学家，数理逻辑学家，社会活动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早年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并留校任教。他一生著述甚多，学识渊博，在众多学科领域都有建树，主要著作有：《论几何学的基础》(1897)、《莱布尼兹的哲学》(1900)、《数学原理》(3卷，与怀特海合作，1910—1913)、《哲学问题》(1911)、《我们对外部世界的知识》(1914)、《逻辑原子主义哲学》(1918—1919)、《心的分析》(1921)、《物的分析》(1927)、《对意义和真理的计究》(1940)、《西方哲学史》(1945)、《人类的知识—其范围和界限》(1948)、《我的哲学发展》(1959)等。

罗素一生还注意研究社会问题，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访问过苏联，并与列宁会面；1920年访问中国，在北京大学等地发表演讲。1938年赴美长期讲学。由于他在诸多领域的杰出贡献，1949年获荣誉勋章，195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50年代积极参加和平运动，反对核战争，获世界和平奖。

哲学,就我对这个词的理解来说,乃是某种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东西。它和神学一样,包含着人类对于那些迄今仍为确切的知识所不能肯定的事物的思考;但是它又象科学一样是诉之于人类的理性而不是诉之于权威的,不管是传统的权威还是启示的权威。一切确切的知识——我是这样主张的——都属于科学;一切涉及超乎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都属于神学。但是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还有一片受到双方攻击的无人之域;这片无人之域就是哲学。思辩的心灵所最感到兴趣的一切问题,几乎都是科学所不能回答的问题;而神学家们的信心百倍的答案,也已不再象它们在过去的世纪里那么令人信服了。世界是分为心和物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心是什么?物又是什么?心是从属于物的吗?还是它具有独立的能力呢?宇宙有没有任何的统一性或者目的呢?它是不是朝着某一个目标演进的呢?究竟有没有自然律呢?还是我们信仰自然律仅仅是出于我们爱好秩序的天性呢?人是不是天文学家所看到的那种样子,是由不纯粹的碳和水化合而成的一块微小的东西,无能地在一个渺小而又不重要的行星上爬行着呢?还是他是哈姆雷特所看到的那种样子呢?也许他同时是两者吗?有没有一种生活方式是高贵的,而另一种是卑贱的呢?还是一切的生活方式全属虚幻无谓呢?假如有一种生活方式是高贵的,它所包含的内容又是什么?我们又如何能够实现它呢?善,为了能够直接受人尊重,就必须是永恒的吗?或者说,哪怕宇宙是坚定不移地趋向于死亡,它也还是值得加以追求的吗?究竟有没有智慧这样一种东西,还是看来仿佛是智慧的东西,仅仅是极精炼的愚蠢呢?对于这些问题,在实验室里是找不到答案的。各派神学都曾宣称能够做出极其确切的答案,但正是他们的这种确切性才使近代人满腹狐疑地去观察他们。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如果不是对于它们的解答的话,——就是哲学的业务了。

你也许会问,那末为什么要在这些不能解决的问题上面浪费时间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以一个历史学家的身份来回答,也可以以一个面临着宇宙孤寂的恐怖感的个人的身份来回答。

历史学家所作的回答,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将在本书内提出来。自从人类能够自由思考以来,他们的行动在许多重要方面都有赖于他们对于世界与人生的各种理论,关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理论。这一点在今天正象在已往任何时候是同样地真确。要了解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我们必须了解它的哲学;要了解它的哲学,我们必须在某种程度上自己就是哲学家。这里就有一

种互为因果的关系,人们生活的环境在决定他们的哲学上起着很大的作用,然而反过来他们的哲学又在决定他们的环境上起着很大的作用。这种贯穿着许多世纪的交互作用就是本书的主题。

然而,也还有一种比较个人的答案。科学告诉我们的是我们所能够知道的事物,但我们所能够知道的是很少的;而我们如果竟忘记了我们所不能知道的是何等之多,那末我们就会对许多极重要的事物变成麻木不仁了。另一方面,神学带来了一种武断的信念,说我们对于事实上我们是无知的事物具有知识,这样一来就对于宇宙产生了一种狂妄的傲慢。在鲜明的希望与恐惧之前而不能确定,是会使人痛苦的;可是如果在没有令人慰藉的神话故事的支持下,我们仍希望活下去的话,那末我们就必须忍受这种不确定。无论是想把哲学所提出的这些问题忘却,还是自称我们已经找到了这些问题的确凿无疑的答案,都是无益的事。教导人们在不能确定时怎样生活下去而又不致为犹疑所困扰,也许这就是哲学在我们的时代仍然能为学哲学的人所做出的主要事情了。

与神学相区别的哲学,开始于纪元前六世纪的希腊。在它经过了古代的历程之后,随着基督教的兴起与罗马的灭亡,它就又浸没于神学之中。哲学的第二个伟大的时期自十一世纪起至十四世纪为止,除了象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1195—1250)那样极少数的伟大的叛逆者而外,是完全受天主教会支配着的。这一时期以种种混乱而告结束,宗教改革就是这些混乱的最后结果。第三时期,自十七世纪至今天,比起前两个时期的任何一个来,更受着科学的支配;传统的宗教信仰仍占重要地位,但却感到有给自己作辩护的必要了;而每当科学似乎是使改造成为必要的时候,宗教信仰总是会被改造的。这一时期很少有哲学家在天主教立场上是正统派,而且在他们的思想里世俗的国家也要比教会重要得多。

社会团结与个人自由,也象科学与宗教一样,在一切的时期里始终是处于一种冲突状态或不安的妥协状态。在希腊,社会团结是靠着对城邦的忠诚而得到保证的;即使是亚里士多德(虽则在他那时候亚力山大正在使得城邦成为过时的陈迹),也看不出任何其他体制能有更多的优点。个人自由因个人对城邦的责任而被缩减的程度,是大有不同的。在斯巴达,个人所享有的自由要和现在的德国或俄国一样地少;在雅典,则除了有时候有迫害而外,公民在最好的时代里曾享有过不受国家所限制的极大的自由。希腊思想直到亚里士多

德的时代为止，一直为希腊人对城邦的宗教热诚与爱国热诚所支配；它的伦理体系是适应于公民们的生活的，并且有着很大的政治成份在内。当希腊人最初臣服于马其顿人，而后又臣服于罗马人的时候，与他们独立的岁月相适应的那些概念就不能再适用了。这就一方面，由于与传统断绝而丧失了蓬勃的生气，而另一方面又产生了一种更为个人化的、更缺少社会性的伦理。斯多葛派认为有德的生活乃是一种灵魂对上帝的关系，而不是公民对国家的关系。这样他们便为基督教准备了道路，因为基督教和斯多葛主义一样，起初也是非政治性的，在它最初的三个世纪里，它的信徒们都是对政府毫无影响的。从亚历山大到君士坦丁的六个半世纪里，社会团结既不是靠哲学，也不是靠古代的忠诚，而是靠强力，最初是靠军队的强力，尔后则是靠行政机构的强力，才获得保障的。罗马军队、罗马道路、罗马法与罗马官吏首先创立了，随后又维系了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没有什么是可以归功于罗马哲学的，因为根本就没有什么罗马哲学。

在这个漫长的时期里，从自由的时代所继承下来的希腊观念经历了一番逐渐转化的过程。某些古老的观念，尤其是那些我们认为最富于宗教色彩观念，获得了相对的重要性；而另外那些更富理性主义色彩观念则因为它们不再符合时代的精神，就被人们抛弃了。后来的异教徒们就是以这种方式整理了希腊的传统，使它终于能够被吸收到基督教的教义里来。

基督教把一个早已为斯多葛派学说所包含了的、然而对古代的一般精神却是陌生的重要见解给普及化了。我指的就是认为一个人对上帝的责任要比他对国家的责任更为必要的那种见解。象苏格拉底和使徒们所说的“我们应该服从神更甚于服从人”的这种见解，在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以后一直维持了下来，因为早期基督徒的皇帝们都是阿利乌斯教派倾向于阿利乌斯主义。当皇帝变成了正统的教徒以后，这种见解就中断了。在拜占廷帝国它却仍然潜存着，正如后来它在俄罗斯帝国一样，俄罗斯帝国的基督教本是从君士坦丁堡传来的。但是在西方，天主教的皇帝们几乎是立即（除了高卢的某几部分而外）就被异教徒的蛮人征服者所取而代之，于是宗教忠贞应优越于政治忠贞的思想就保存了下来，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迄今依然保存着。

野蛮人的入侵中断了西欧文明达六个世纪之久。但它在爱尔兰却不绝如缕，直到九世纪时丹麦人才摧毁了它；在它灭亡之前它还在那里产生过一位出色的人物，即司各脱·厄里根纳。在东罗马帝国，希腊文明以一种枯朽的形式

继续保存下去,好象在一所博物馆里面一样,一直到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为止。然而除了一种艺术上的传统以及查士丁尼的罗马法典而外,世界上并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是出自君士坦丁堡的。

在黑暗时代,自五世纪末叶至十一世纪中叶,西罗马世界经历了一些非常有趣的变化。基督教所带来的对上帝的责任与对国家的责任两者之间的冲突,采取了教会与国王之间的冲突的形式。教皇的教权伸展到意大利、法国与西班牙、大不列颠与爱尔兰、德国、斯堪的那维亚与波兰。起初,除了在意大利和法国南部以外,教皇对于主教们和修道院长们的控制力量本是很薄弱的;但自从格雷高里第七的时代(十一世纪末)以来,教皇对他们就有了实际而有效的控制力量。从那时候起,教士在整个西欧就形成一个受罗马指挥的单一组织,巧妙地而又无情地追逐着权势;一直到公元1300年以后,他们在与世俗统治者的斗争之中通常总是胜利的。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冲突不仅是一场教士与俗人的冲突。同时也是一场地中海世界与北方蛮族之间的冲突的重演。教会的统一就是罗马帝国统一的反响;它的祷文是拉丁文,它的首脑人物主要是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和南部法国人。他们的教育(当教育恢复起来之后)也是古典的;他们的法律观念和政府观念在马尔库斯·奥勒留皇帝看来要比近代的君主们看来恐怕更容易理解。教会同时既代表着对过去的继续,又代表着当时最文明的东西。

反之,世俗权力则掌握在条顿血统的王侯们的手中,他们企图尽力保持他们从日耳曼森林里所带出来的种种制度。绝对的权力与这些制度是格格不入的;对于这些生气勃勃的征服者们说来显得是既沉闷而又毫无生气的那些法律制度,情形也是如此。国王必须和封建贵族分享自己的权力,但是大家都希望不时地可以采取战争、谋杀、掠夺或者奸淫的形式以发泄激情。君主们也可以忏悔,因为他们衷心里是虔诚的,而且忏悔本身毕竟也是激情的一种形式。可是教会却永远也不能使他们有近代雇主所要求于,而且通常可以获得于他的雇工们的那种循规蹈矩的良好品行。当精神激动的时候,如果他们不能喝酒、杀人、恋爱,那末征服全世界又有什么用呢?而且他们有勇敢的骑士队伍,为什么要听命于发誓独身而又没有兵权的书呆子呢?尽管教会不同意,他们仍然保存着决斗和比武的审判方法,而且他们还发展了马上比武和献殷勤的恋爱。有时候,他们甚至一阵狂暴发作还会杀死显赫的教士。

所有的武装力量都在国王这方面,然而教会还是胜利的。教会获得胜利,

部分地是因为它几乎享有教育的独占权,部分地是因为国王们彼此经常互相作战;但是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主要地却是因为统治者和人民都深深地相信教会掌握着升天堂的钥匙的权力。教会可以决定一个国王是否应该永恒地升天堂还是下地狱;教会可以解除臣民们效忠的责任,从而就可以鼓动反叛。此外,教会还代表着足以代替无政府状态的秩序,因而就获得了新兴的商人阶级的支持。尤其在意大利,这最后的一点是有决定意义的。

条顿人至少要保持教会一部分的独立性的企图,不仅表现在政治上,也表现在艺术、传奇、骑士道和战争上。但这一点却很少表现在知识界,因为教育差不多是完全限于教士阶级的。中古时代所公开表现出来的哲学并不就是一面精确的时代镜子,而仅是一党一派的思想镜子。然而,就在教士里面——尤其是弗兰西斯教团的修道士们——却有相当数目的人,为了各种原因,是和教皇有分歧的。此外,在意大利,文化传播到俗人方面来要比在阿尔卑斯以北早上好几个世纪。弗里德里希第二曾试图建立一种新宗教,这代表着反教廷文化的极端;而托马斯·阿奎那诞生于弗莱德利克第二具有无上权威的那不勒斯王国,却直到今天始终是教廷哲学的典型阐扬者。大约五十年之后,但丁成就了一套综合,并且给整个的中古观念世界做出了唯一的一套均衡的发挥。

但丁以后,由于政治上的以及理智上的种种原因,中古哲学的综合便破灭了。当中古哲学存在的时候,它具有一种整齐而又玲珑完整的性质,这个体系所论述到的任何一点都是和它那极其有限的宇宙中的其他内容摆在一个非常精确的关系之上的。但是宗教大分裂、宗教大会运动以及文艺复兴的教廷终于导向宗教改革,宗教改革便摧毁了基督教世界的统一性以及经院学者以教皇为中心的政府理论。在文艺复兴时代,新的知识,无论是关于古代的或是关于地球表面的,都使人厌倦于理论体系;人们感到理论体系是座心灵的监狱。哥白尼天文学赋给地球的地位与人类的地位,远比他们在托勒密的理论中所享有的地位要卑微得多。在知识分子中间,对新事物的乐趣代替了对于推理、分析、体系化的乐趣;虽然在艺术方面文艺复兴仍然崇尚整齐有序,但是在思想方面它却喜欢大量而繁富的混乱无章。在这方面,蒙台涅是这一时代最典型的代表人物。

在政治理论方面,正象除了艺术而外的任何其他事物一样,也发生了秩序的崩溃。中世纪,虽然事实上是动荡不宁的,但在思想上却被一种要求合法性的热情、被一种非常严谨的政权理论所支配着。一切权力总归是出自上帝;上

帝把神圣事物的权力交给了教皇,把俗世事情的权力交给了皇帝。但在十五世纪,教皇和皇帝同样地都丧失了自己的重要性。教皇变成了仅仅是意大利诸侯的一员,他在意大利的强权政治里面从事于种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复杂而又无耻的勾当。在法国、西班牙和英国,新的君主专制的民族国家在他们自己的领土上享有的权力,是无论教皇或者皇帝都无力加以干涉的。民族国家,主要是由于有了火药的缘故,对人们的思想和感情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影响,并且渐次地摧毁了罗马所遗留下来的对于文明统一性的信念。

这种政治上的混乱情形在马基雅弗利的《君王论》一书中得到了表现。政治已没有任何指导的原则,而变成赤裸裸的争夺权力了;至于怎样才能把这种赌博玩得很成功,《君王论》一书也提出了很精明的意见。在希腊的伟大时代里出现过的事,再一次出现于文艺复兴的意大利:传统的道德束缚消失了,因为它们被人认为是与迷信结合在一起的;从羁绊中获得的解放,使得个人精力旺盛而富于创造力,从而便产生了极其罕见的天才的奔放;但是由于道德败坏而不可避免地造成的无政府状态与阴谋诡诈,却使得意大利人在集体方面成为无能的了,于是他们也象希腊人一样,倒在了别的远不如他们文明、但不象他们那样缺乏社会团结力的民族的统治之下了。

然而结局并不象在希腊那么惨重,因为许多新的强而有力的民族表现出来他们自己也象意大利人已往那样地能够有伟大的成就,只有西班牙是例外。

从十六世纪以后,欧洲思想史便以宗教改革占主导地位。宗教改革是一场复杂的多方面的运动,它的成功也要归功于多种多样的原因。大体上,它是北方民族对于罗马东山再起的统治的一种反抗。宗教曾经是征服了欧洲北部的力量,但是宗教在意大利已经衰颓了:教廷作为一种体制还存在着,并且从德国和英国吸取大量的贡赋,但是这些仍然虔诚的民族却对于波尔嘉家族和梅狄奇家族不能怀有什么敬意,这些家族借口要从炼狱里拯救人类的灵魂,而收敛钱财大肆挥霍在奢侈和不道德上。民族的动机、经济的动机和道德的动机都结合在一起,就格外加强了对罗马的反叛。此外,君王们不久就看出来,如果他们自己领土上的教会完全变成为本民族的,他们便可以控制教会;这样,他们在本土上就要比以往和教皇分享统治权的时候更加强而有力。由于这一切的原因,所以路德的神学改革在北欧的大部分地区,既受统治者欢迎,也受人民欢迎。

天主教教会有三个来源：它的圣教历史^①是犹太的，它的神学是希腊的，它的政府和教会法，至少间接地是罗马的。宗教改革摒除了罗马的成份，冲淡了希腊的成份，但是大大地加强了犹太的成份。它就这样和民族主义的力量展开了合作。这些民族主义的力量正在摧毁着最初由罗马帝国而后又被罗马教会所造成的那种社会团结的成果。在天主教的学说里，神圣的启示并不因为有圣书而结束，而是一代一代地通过教会的媒介继续传下来的；因此，个人的意见之服从于教会，就成为每个人的责任。反之，新教徒则否认教会是传达启示的媒介；真理只能求之于圣经，每一个人都可以自己解释圣经。如果人们的解释有了分歧，那末也并没有任何一个由神明所指定的权威可以解决这种分歧。实际上国家已经要求着曾经是属于教会的权利了，但这乃是一种篡夺。在新教的理论里，灵魂与上帝之间是不该有任何尘世的居间人的。

这一变化所起的作用是极其重大的。真理不再需要请权威来肯定了，真理只需要内心的思想来肯定。于是很快地就发展起来了一种趋势，在政治方面趋向于无政府主义，而在宗教方面则趋向于神秘主义。这和天主教的正统体系始终是难于适应的。这时出现的并不只是一种新教而是许多的教派；不是一种与经院派相对立的哲学而是有多少位哲学家就有多少种哲学；不是象在十三世纪那样，有一个皇帝与教皇相对立，而是有许许多多的异端的国王。结果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文学上，就都有着一种不断加深的主观主义；起初这是作为一种从精神奴役下要求全盘解放的活动，但它却朝着一种不利于社会健康的个人孤立倾向而稳步前进了。

近代哲学始于笛卡儿，他基本上所肯定为可靠的就是他自己和他的思想的存在，外在世界是由此而推出来的。这只是那个通过贝克莱、康德直到费希特的总的发展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到了费希特遂认为万物都只是自我的流溢。这是不健康的；从此之后，哲学一直在企图从这种极端逃到日常生活的常识世界里去。

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和哲学上的主观主义携手并进。早在路德在世的时候，就有些不受欢迎又不被承认的弟子们已经发展了再洗礼的学说了，这种学说有一个时期统治了闵斯特城。再洗礼派摒弃一切的法律，因为他们认为好人是无时无刻不被圣灵所引导的，而圣灵又是不可能受任何公式的束缚的。

① 指圣经中所记述的历史。——译者

从这个前提出发,他们就达到了共产主义与两性杂交的结论;因此,他们在经过一段英勇抗抵之后终于被人消灭了。但是他们的学说却采取了更柔和的形式而流传到荷兰、英国和美国;这就是历史上贵格会的起源。在十九世纪又产生了另一种形式更激烈的、已经和宗教不再有联系的无政府主义。在俄国、在西班牙、以及较小的程度上也在意大利,它都有过相当的成功;并且直到今天,它在美国移民当局的眼里还是个可怕的怪物,这种近代的形式虽然是反宗教的,但是仍然具有很多的早期新教的精神;它的不同点主要就在于把路德针对着教皇的那种仇恨转过来针对着世俗的政府。

主观主义一旦脱缰之后,就只能一泻到底而不能再被束缚于任何的界限之内。新教徒在道德上之强调个人的良心,本质上乃是无政府主义的。但习惯与风俗却是如此之有力,以致于除了象闵斯特那样暂时的爆发而外,个人主义的信徒们在伦理方面仍然是按照传统所认为的道德方式来行动,但这是一种不稳定的平衡。十八世纪“感性”崇拜开始破坏了这种平衡:一种行为之受到赞美并不是因为它有好结果或者因为它与一种道德教条相符合,而是因为它有那种把它激发起来的情操。从这种态度就发展了象卡莱尔和尼采所表现的那种英雄崇拜,以及拜伦式的对于任何激情的崇拜。

浪漫主义运动在艺术上、在文学上以及在政治上,都是和这种对人采取主观主义的判断方式相联系着的,亦即不把人作为集体的一个成员而是作为一种美感上的愉悦的观照对象。猛虎比绵羊更美丽,但是我们宁愿把它关在笼子里。典型的浪漫派却要把笼子打开来,欣赏猛虎消灭绵羊时那幕壮丽的纵身一跃。他鼓励着人们想象他们自己是猛虎,可是如果他成功的话,结果并不会是完全愉快的。

针对着近代主观主义的比较不健康的形式,曾经出现过各种不同的反应。首先是一种折衷妥协的哲学,即自由主义的学说,它企图给政府和个人指定其各自的领域。这种学说的近代形式是从洛克开始的,洛克对于“热情主义”——即再洗礼派的个人主义——和对于绝对的权威以及对传统的盲目服从,是同样地反对的。另一种更彻底的反抗则导致了国家崇拜的理论。这种理论把天主教所给予教会,甚至于有时候是给予上帝的那种地位给了国家。霍布斯、卢梭和黑格尔代表了这种理论的各个不同方面,而他们的学说在实践上就体现为克伦威尔、拿破命和近代的德国。共产主义在理论上是和这些哲学距离得非常遥远的,但是在实践上也趋向于一种与国家崇拜的结果极其相

似的社会形态。

自从公元前 600 年直到今天这一全部漫长的发展史上, 哲学家们可以分为希望加强社会约束的人与希望放松社会约束的人。与这种区别相联系着的还有其他的区别。纪律主义分子宣扬着某种或新或旧的教条体系, 并且因此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就不得不仇视科学, 因为他们的教条并不能从经验上加以证明。他们几乎总是教训人说, 幸福并不就是善, 而惟有“崇高”或者“英雄主义”才是值得愿望的。他们对于人性中的非理性的部分有着一种同情, 因为他们感到理性是不利于社会团结的。另外一方面, 则自由主义分子, 除了极端的无政府主义者而外, 都倾向于科学、功利与理性而反对激情, 并且是一切较深刻形式的宗教的敌人。这种冲突早在我们所认为的哲学兴起之前就在希腊存在着了, 并且在早期的希腊思想中已经十分显著。它变成为各种形式, 一直持续到今天, 并且无疑地将会持续到未来的时代。

很显然, 在这一争论中——就象所有经历了漫长时期而存留下来的争论一样——每一方都是部分正确的而又部分错误的。社会团结是必要的, 但人类迄今还不曾有过单凭说理的论辩就能加强团结的事。每一个社会都受着两种相对立的危险的威胁: 一方面是由于过分讲纪律与尊敬传统而产生的僵化, 另一方面是由于个人主义与个人独立性的增长而使得合作成为不可能, 因而造成解体或者是对外来征服者的屈服。一般说来, 重要的文明都是从一种严格和迷信的体系出发, 逐渐地松弛下来, 在一定的阶段就达到了一个天才辉煌的时期; 这时, 旧传统中的好东西继续保存着, 而在其解体之中所包含着的那些坏东西则还没有来得及发展。但是随着坏东西的发展, 它就走向无政府主义, 从而不可避免地走向一种新的暴政, 同时产生出来一种受到新的教条体系所保证的新的综合。自由主义的学说就是想要避免这种无休止的反复的一种企图。自由主义的本质就是企图不根据非理性的教条而获得一种社会秩序, 并且除了为保存社会所必须的束缚而外, 不再以更多的束缚来保证社会的安定。这种企图是否可以成功, 只有未来才能够断定了。

目 录

人 物 篇

A	
阿贝尔·····	(3)
阿伯拉尔·····	(3)
阿德勒·····	(4)
阿恩海姆·····	(5)
阿尔伯特·····	(6)
阿尔都塞·····	(8)
阿尔蒙德·····	(9)
阿伏伽德罗·····	(9)
阿哥里柯拉·····	(10)
阿基米德·····	(10)
阿克顿·····	(11)
阿拉贡·····	(12)
阿里斯托芬·····	(12)
阿里乌·····	(13)
阿罗·肯尼思·约瑟夫·····	(13)
阿明尼乌·····	(15)
阿那克萨哥拉·····	(15)
阿那克西曼德·····	(16)
阿那克西米尼·····	(17)
阿诺德·····	(17)
阿·托尔斯泰·····	(17)
埃里克森·····	(18)
埃利希·····	(19)
埃皮克泰德·····	(20)
埃斯库罗斯·····	(21)
艾宾浩斯·····	(21)
艾哈德·路德维希·····	(23)
艾克尔斯·····	(23)
艾略特·····	(24)
艾森克·····	(25)
艾特马托夫·····	(25)
爱迪生·····	(26)
爱尔维修·····	(27)
爱克哈特·····	(28)
爱拉斯谟·····	(29)
爱留根纳·····	(29)
爱伦堡·····	(30)
爱伦·坡·····	(31)
爱因斯坦·····	(31)
安瑟尔谟·····	(33)
安徒生·····	(34)
奥巴林·····	(34)

奥本海·····	(3 5)	白贲士·····	(5 6)
奥尔波特·····	(3 5)	拜伦·····	(5 7)
奥古斯丁·····	(3 6)	班杜拉·····	(5 7)
奥古斯特·孔德·····	(3 7)	班克罗夫特·····	(5 8)
奥康的威廉·····	(3 8)	班扬·····	(5 9)
奥拉德·····	(3 9)	保罗 I·····	(5 9)
奥里根·····	(3 9)	保罗 II·····	(6 0)
奥林·····	(4 0)	保罗·尤利乌斯·····	(6 1)
奥尼尔·····	(4 2)	鲍林·····	(6 1)
奥斯汀·····	(4 2)	鲍姆嘉通·····	(6 2)
奥苏伯尔·····	(4 3)	俾耳德·····	(6 3)
奥维德·····	(4 4)	贝尔·····	(6 3)
B			
巴贝夫·····	(4 4)	贝尔·D·····	(6 4)
巴比塞·····	(4 5)	贝尔·A.G·····	(6 5)
巴尔扎克·····	(4 5)	贝尔纳·····	(6 5)
巴甫洛夫·····	(4 6)	贝卡里亚·····	(6 6)
巴格莱·····	(4 7)	贝克莱·····	(6 6)
巴赫金·····	(4 7)	贝克特·····	(6 8)
巴霍芬·····	(4 8)	贝拉米·····	(6 8)
巴枯宁·····	(4 8)	贝塔朗菲·····	(6 9)
巴拉茨基·····	(4 9)	倍尔·····	(7 0)
巴拉赛尔苏斯·····	(5 0)	本尼狄克·····	(7 0)
巴门尼德·····	(5 0)	本特利·····	(7 1)
巴特勒·····	(5 1)	比昂多·····	(7 1)
巴斯德·····	(5 2)	比德·····	(7 2)
巴斯夏·弗雷德里瓦·····	(5 3)	比内·····	(7 3)
巴希·····	(5 4)	彼特拉克·····	(7 4)
巴特·K·····	(5 5)	彼得·郎巴德·····	(7 4)
巴特·R·····	(5 6)	庇古·····	(7 5)
		庇护九世·····	(7 5)
		庇护十二世·····	(7 6)

- | | | | |
|---------------|---------|--------------|-----------|
| 庇护十一世····· | (7 6) | 布尔····· | (1 0 0) |
| 毕达哥拉斯····· | (7 6) | 布尔加科夫····· | (1 0 1) |
| 裨治文····· | (7 7) | 布丰····· | (1 0 1) |
| 边沁····· | (7 8) | 布坎南····· | (1 0 2) |
| 别林斯基····· | (7 9) | 布拉德雷····· | (1 0 4) |
| 波埃修····· | (8 0) | 布兰代斯····· | (1 0 5) |
| 波德莱尔····· | (8 1) | 布朗基····· | (1 0 6) |
| 波里比阿····· | (8 1) | 布莱希特····· | (1 0 6) |
| 波利比····· | (8 2) | 布雷德利····· | (1 0 7) |
| 波普····· | (8 3) | 布卢姆····· | (1 0 8) |
| 波义耳····· | (8 4) | 布鲁纳····· | (1 0 8) |
| 波恩····· | (8 5) | 布鲁内尔····· | (1 1 0) |
| 柏格森····· | (8 5) | 布鲁尼····· | (1 1 1) |
| 柏克····· | (8 6) | 布鲁诺····· | (1 1 2) |
| 柏拉图····· | (8 7) | 布洛····· | (1 1 4) |
| 柏姆·巴维克····· | (8 8) | 布洛赫····· | (1 1 5) |
| 伯尔纳(明谷的)····· | (9 0) | 布罗代尔····· | (1 1 5) |
| 伯拉纠····· | (9 0) | 布瑞····· | (1 1 6) |
| 伯里克利····· | (9 1) | 布瓦罗····· | (1 1 6) |
| 伯利·阿道夫····· | (9 1) | | |
| 勃兰兑斯····· | (9 2) | C | |
| 勃朗 .L····· | (9 3) | 查斯丁····· | (1 1 7) |
| 勃朗 .R····· | (9 4) | 车尔尼雪夫斯基····· | (1 1 7) |
| 勃雷····· | (9 4) | 茨温利····· | (1 1 8) |
| 勃洛克····· | (9 4) | 茨威格····· | (1 1 9) |
| 博丹····· | (9 5) | | |
| 博尔丁····· | (9 6) | D | |
| 博克····· | (9 6) | 达尔····· | (1 1 9) |
| 博马舍····· | (9 7) | 达尔曼····· | (1 2 0) |
| 薄伽丘····· | (9 8) | 达尔文····· | (1 2 0) |
| 布阿吉尔贝尔····· | (9 9) | 达·芬奇····· | (1 2 2) |